

印刷發明前的中國書和文字記錄

钱存训 著

四書

卷之三

六十四卦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5
3

G 256.1
88-13

09.466

钱存训 著

郑如斯 增订

印刷发明前的中国书和文字记

文锦题签



S0641938

印刷工业出版社出版 北京



DN39/07

印刷发明前的中国书和文字记录

钱存训 著 郑如斯 增订

※

印刷工业出版社出版

(北京复外翠微路2号)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6.125 字数: 135 千字

1988年1月 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500 定价: 3.60 元

ISBN 7-80000-008-7/G·1

大墨子卷之四

子墨子曰吾非與之並世
同時親聞其聲見其色也
以其所書於竹帛鏤於金
石琢於槃盂傳遺後世子
孫者知之

本书系根据周宁森
博士之中文译稿《书于
竹帛》增订而成，谨此
声明，以表谢意。

自序

本书原名《书于竹帛》Written on Bamboo and Silk, 是综合讨论印刷发明前中国书籍制度和铭文发展之作。英文本于1957年底完成,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在1962年出版,列为《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研究丛书》之一。当初写作这书的动机,主要是由于西方出版有关书籍历史的著作中,在印刷发明前这一段时期,很少提到中国,因为没有用西文写作的资料可供参考,许多这一类书中,不是空白,就是误解。为了弥补这一缺失,作者搜集了这一时期的有关文献和实物资料,作一全面而有系统的阐述,使西方学者在研究世界图书发展史时,对中国文化在这一方面的贡献增加了解。

当时,西方对中国学术研究的兴趣,还没有普遍到各个专题的领域,同时这书的题材比较冷僻,出版社估计这书的读者不多,销路有限。不料出版后受到各国学者的一致好评和推介,3月之间,第一版就已售完,不久又3次续印。稍后,正文部分由周宁森博士译成中文,嘱为校阅,迟迟没有完成。其间因全汉升教授的敦促,选用书中译文几章,先后发表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受到中文读者的注意。1972年夏间得芝大马泰来同学相助,全部加以修订,补译前言、图表和附注。作者并将内容重加增删,补入10年来新发现的材料,澳洲国立大学巴纳德(Noel Barnard)教授也寄来新摹本长沙缣书的照片,作为插图,全书复承劳贞一教授审阅一过,写作后序,加以补充引伸,使这中文本的内容较见充实,也有好多论点和英文本不尽相同。修改完毕后,即采用已故董作宾先生以甲骨文为这书所题的《中国古代书史》作为书名,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于1975年出版,因此这本书得与国内外的中文读者见面。

英文本出版后不久，就由日本宇都木章和沢谷昭次两教授着手日译，其后又得竹内信子和广濑洋子两位女士合作，并参考中文本再度增订，将迄至 1979 年止所见新资料加入附注，另编制日文“参考文献书目”和“事项、书名、人名索引”。又承京都大学平冈武夫教授写作长序，指出汉字的伟大和重要性，发人深省。继中文本出版之后，日文本即以《中国古代书籍史——竹帛に书す》为题，由东京法政大学出版社于 1980 年出版。

1984 年夏间作者再度回国访问，得到国内友人的鼓励，建议将这书在国内用简体字重排出版。不久得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郑如斯教授的热情相助，再次增订，将本世纪 70 年代以来新发现的考古资料补入正文和附注，内容及图版也略有更动，并改用《印刷发明前的中国书和文字记录》作为书名，由印刷工业出版社重排出版，感到十分荣幸。

正如作者在日文本的序言中所说，此书虽是概论性质，主要根据前人对各专题研究的成果加以系统的综合阐释，但其中也有不少个人的意见，值得特别提出，如竹、木应用于书写的先后，篇、卷名称的考订，帛书的特殊用途，纸的起源和《说文》中“纸”字定义之诠释，以及推测中国文字之直行书写与自上至下和自右至左排列顺序的原因等等，都在书中试作解答。同时也指出中国古代文字记录的多产、延续与广被性，对中国文化的多彩多姿所作出的贡献及其在世界文明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希望读者加以指正。

回顾此书从 1956 年开始写作，迄今正好 30 年。其间得以陆续修订，增补流传，实为始料所未及。诚如平冈教授在日文本的序言中所说：这是一部幸运的书，也是一部含有生命的书。当然，这些收获，多承各方面的专家和学者合作相助，国内外友人多方鼓励，以及文锦和家中亲人的热情支援，使这本书的内容不致陈旧，并得以继续成长，谨在此特别致谢。

钱存训

1986 年 6 月芝加哥大学

增订说明

中国古代文明历史悠久，生产技术和科学文化水平曾处于世界前列，书籍的发达程度也是如此。我国很早发明了文字，从而创作了大量的图书。中国文字和书籍影响了周围的一些民族，而图书的材料和制作工艺（如纸与印刷）则对全世界作出了贡献。

对于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后的中国图书事业，中外学者多有研究，而对印刷术发明前中国书史的系统论述却十分缺乏。这是由于印刷发明前中国书籍有着近两千年的历史，用于记载文字的材料又十分广泛和零碎，具有中国特色的书籍形式和制度正在形成演变之中。因此，要想从繁杂的材料中理出头绪，探明其发展规律，没有渊博的学识和精密的研究方法，实在不易着手。钱存训先生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的钻研，填补了这一方面的空白。本书即是他研究中国印刷发明前的文字记载和书籍制度的一部专著。

钱先生在美国长期从事中国文化史、图书史、版本目录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发表过许多有关论著，对介绍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成就和沟通东西方学术思想交流，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印刷术发明前的中国书和文字记录》这部书中，他引用大量中外文献与考古实物相互参证，并配以数字和图表，首先概述了中国古代载籍的价值及其演进的社会背景和学术因素，然后分别探讨了甲骨、金文、陶器、石刻、竹简、木牍、缣帛和纸卷的起源、内容、性质、记载方法、制作形式和编排制度。从社会生产力和学术思想背景上分析它们发展、演变及前后承传关系。书中还专门介绍了中国特有的书写工具：毛笔、墨、砚、书刀，论述了它们的渊源、应用、制造和发展。全书资料丰富、内容充实、阐释详明、见解精辟，生动而又深刻地将中国古代图书发展全貌展现在读者面前，对中国文化史的研

究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本书英文本最初以《书于竹帛》为名，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于1962年出版，受到中外学者的欢迎与好评。1975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中文本，改题《中国古代书史》，内容有所增改，并于1981年再版。1980年东京法政大学又出版日文本。现在，这本书再度增订。为了更确切地反映本书内容，改名《印刷术发明前的中国书和文字记录》，由印刷工业出版社以简体字横排在国内出版。希望得到国内广大读者的欢迎，并有助于这一领域内学术研究的发展。

1979年钱存训先生归国访问，我有幸在北大见到先生，并就中国书史研究中的有关问题交流了看法，聆听教导，受益非浅。先生的这部书一直是我多年来从事中国书史教学的重要参考文献。每读一遍，总有新的体会和收获，并深被先生严谨认真的治学精神和对祖国古代文化成就的深厚激情所感动。

去年春天，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馆长郑炯文先生来京访问，带来本书要在国内出版的消息。我出于对钱先生的敬意和对本书的喜爱，在陈鸿舜老师的鼓励下，接受委托，承担了本书增订工作。一年来，我广泛查阅有关文献，并利用在教学中所积累的资料，将最近十几年来最新考古发现补入书中。全部增订工作在钱先生的指导下于今年5月完成。增订的资料或插入正文，或放在附注，并将原书附注调整于每章之后，书中一些单位名词和数字书写格式，也做了少许更动。在附录中，除了原有的后序外，另选入英文、中文和日文本的书评或序言各一篇，代表中外学者对本书的评介和意见。中文本书评内有每章提要，可帮助读者对书中内容的了解。

郑如斯

1986年7月于北大中美图书馆

前 言

“书于竹帛”是一句表示古代典籍的成语，可以用来说明中国古代书籍演变的一段历史。自上古以至公元后数世纪的一段时期，竹和帛乃是书写的主要材料。原书以之为主题，乃因其与本书所述之范围正好相符；虽然本书除竹帛之外，对其他的古代书写材料，亦加叙及。墨子：“吾非与之并世同时，亲闻其声，见其色也；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槃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最初是依赖竹帛，得以流传至今。

关于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演进，中外学者已作了不少研究。但印刷术发明前之书籍历史，尚少有系统的叙述。印刷术发明前之书史，时间比印刷史为长，而对探讨中国学术思想之渊源及传播，尤为重要。一般西方书籍通史，对中国古代书籍制度之描述，皆甚简略。对中国书籍演变的个别问题，中外学者曾作过专深的研究；但综合性的全面考察之作，迄今尚付阙如。因此综合讨论中国古代书籍制度的专书，除了能作为一般学者修习书籍史和中国文化史的参考外，亦对研治其他学科的学者，提供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情形。

研究中国书籍的演变，而不论及铭文，既不合理，亦不可能。《说文》：“箸于竹帛，谓之书。”铭文是指一般刻勒于金石等坚硬物体表面上的文字。铭刻虽然不能称为“书籍”，但这两种文字记载的分别并不大。典籍记载常刊勒于金石，而铭文亦常转录于书籍之中。因此，本书对各种文字记录的源流及演变，皆加以探讨，不论它们的形式是书籍还是铭刻。

自19世纪末叶以来，在中国国内外的一些古代遗址，先后发现了大批古代文字记录和书写材料。特别是在近数十年，不少罕见

的书写材料和书写工具的出土,对研究中国书籍的演进,提供了不少重要的资料。本书即就现有文献资料和考古学上的实物证据,对中国古代典籍制度之流变,作一综合性的研究;上自公元前14世纪,今日所见最早的中国文字起始,迄公元700年左右,即印刷术发轫之期。这二千多年是中国书史的滥觞时代,所用的各种材料、内容、记载方法、编排,以及若干中国书籍所特有的形式,皆于此时渐渐形成。印刷术发明以后,此等特色乃被继承,成为中国书籍和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印刷术的发明,乃书籍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但它只是改变了生产的方法和增加了书籍的产量,至于书籍的实质和形式,在印刷发明以前和以后,皆没有重大的分别。

本书首章,讨论中国古代载籍的价值,及其演进之社会背景和学术因素。其他各章,描述各时代的主要书写材料、制度,及其特质。此外有一章讨论各种书写工具的流变。最后一章,综论以上所述各点,并对若干重要论题,作概括性的结论和阐释。本书的重点在考察铭刻和书籍之起源,及其形体的演变,如材料、形式、技术、方法等。各种书写材料,皆分别据现有之考古学上和文献上的资料,细加研讨。至于各种古籍作品的作者、时代、以及内容等问题,因属学术史的范围,本书虽偶亦述及,但未加深考。

本书根据的资料,主要是考古发掘报告、古物和铭刻的影本或拓本、及学者对这些古物的研究和阐释。讨论各种书写材料及工具时,多辅以实物图版,以佐说明。同时参用文献上的资料,以阐释或补充实物资料之不足。本书亦间或引用训诂学上的资料,因为远古象形字和会意字,常能说明物体的形态和时人之思想。

本书参考中西文新旧著述约四百种,均在附注中注明。其中期刊论文及西文书籍,皆于第一次引用时注明出处及页数。中文旧籍仅引卷数或篇名;新书亦多不记出版处和年代。读者如欲查考其版本或页数,请参照英文本内的书目和脚注。又书中所用实物单位,长度皆以“厘米”计算;至所称之“尺”或“寸”,乃系引用古书中所称当时的单位,藉资识别。

目 次

第一章 绪论	(1)
一、中国古代文化的遗产.....	(1)
二、贞卜文字.....	(4)
三、官书和档案.....	(5)
四、史官的职权.....	(6)
五、私家著述和藏书.....	(8)
六、焚书事件.....	(9)
七、古籍的整理.....	(10)
八、宗教文学的盛行.....	(12)
第二章 甲骨文	(15)
一、甲骨文的起源和性质.....	(15)
二、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	(16)
三、商代的字汇和书体.....	(18)
四、甲骨的形式和契刻.....	(20)
五、卜辞的内容和排列.....	(22)
六、甲骨中的记事文.....	(24)
第三章 金文和陶文	(28)
一、金文的性质和类别.....	(28)
二、金文的款式和用途.....	(30)
三、镜铭.....	(33)
四、货币文字.....	(34)
五、印章和封泥.....	(35)

六、陶器款识·····	(37)
七、砖瓦款识·····	(39)
第四章 玉石刻辞·····	(43)
一、石鼓文和古代刻石·····	(43)
二、碑碣、摩崖和墓志·····	(45)
三、石经·····	(47)
四、释道经典刻石·····	(50)
五、玉器刻辞·····	(52)
六、拓刷的起源和技术·····	(55)
第五章 竹简和木牍·····	(59)
一、书籍材料的演化·····	(59)
二、战国汉初竹简·····	(61)
三、汉晋木牍·····	(64)
四、竹木的整治·····	(66)
五、简牍的形式·····	(68)
六、行格和书体·····	(70)
七、古书的单位和种类·····	(71)
八、编装的方式·····	(73)
第六章 帛书·····	(77)
一、丝织文化的起源·····	(77)
二、帛书的年代·····	(79)
三、帛书的发现·····	(80)
四、长沙缙书和帛画·····	(81)
五、帛卷的材料和形式·····	(83)
六、帛书的特殊用途·····	(85)
第七章 纸卷·····	(90)
一、纸的定义和性质·····	(90)
二、纸的发明·····	(93)
三、纸的流传和广被·····	(94)

四、纸的西源说	(96)
五、古纸的发现	(98)
六、敦煌纸卷	(100)
七、古代制纸的方法	(101)
八、修染和保管	(103)
九、卷轴制度	(104)
第八章 书写工具	(111)
一、毛笔的发展	(111)
二、毛笔的形式	(113)
三、黑墨和丹书	(114)
四、烟墨	(115)
五、漆书和石墨	(117)
六、砚石的质料和形式	(119)
七、书刀的形制和用途	(121)
第九章 结论	(126)
一、书写材料的类别	(126)
二、古代文献的传承	(126)
三、各种铭文的年代	(127)
四、中国书籍的起源和发展	(128)
五、书写和复制的技术	(128)
六、中国文字的演化	(129)
七、字汇的增加	(129)
八、中国文字书写的顺序	(130)
九、中国文字记录发展的因素	(131)
原《中国古代书史》后序	劳 翰 (133)
附录一 本书中文本《中国古代书史》评介	李 棣 (140)
附录二 本书英文本《书于竹帛》评介	李约瑟 (146)
附录三 本书日文本《中国古代书籍史》序言	平冈武夫 (148)
图版	(151)

第一章 绪 论

一、中国古代文化的遗产

人类的历史,大部分多赖文字记录的流传,得以保存迄今。中国人对于文字记录的方式和技术,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自有其特殊的地位。譬如现代世界上通行的书籍和读物,其基本特质是将文字用黑墨印在白纸上。在制作材料和生产方法的演进中,中国的贡献可以说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纸在公元前后在中国发明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远在公元七八世纪,中国人便首先应用雕版印刷,而活字版的发明,亦远在欧洲谷登堡(Johann Gutenberg,约1397年——1468年)之前400年。^①由煤烟制成的墨,可以溯源到中国远古时代,其优良的特质,尤其光泽和持久性,向为一般西方学者所称颂。^②在纸、墨和印刷术被结合采用以后,书籍才能大量生产,流通广远。

印刷术是人们公认的“文明之母”,而纸则是印刷术发明之前驱。一般学者都公认,在古代文化交通的各种成就中,没有一种发明是可以和造纸术及印刷术的重要相比的;二者对现代文明皆有极其深远的影响。甚至在现代的日常生活中,虽然还有其他各种传播媒介,但都不能替代纸和印刷术所具有的基本性和永久性。^③

甚至在纸的发明以前,中国在文字记录的发展史上,就已经有不少重要的贡献。譬如:远在古代,一些世界上其他民族所罕用的材料,像竹简和缣帛,只有中国人用以书写。其他如兽骨、青铜、石板等,虽亦曾为其他民族所采用,但在中国,却使用得更普遍,也更精巧。至于毛笔,在中国很早就用作书写的基本工具。毛笔不仅影响了中国文字的风格,更创造了书法;正如绘画一般,书法也成

为中国杰出的艺术之一。

中国人很早便致力于文字的机械复印。公元前1,000年左右,浮雕的阳文印章及字范的应用,以及其后使用雕刻100多字的大型木章,都已显示出这种努力于代替手抄复本的趋向。在纸与墨的质量改进之后,印刷术发明之前,用刺孔镂花的纸版复印图案和画像,以及用纸墨拓印碑文的技术都已很发达。尤其拓本技术,很近似雕板印刷,因此促进了文字大量复印的可能性。

中国文字记录的一个重大的特点,便是它独有的持续性。这一特点使得一个有创造性的远古文化,得以继续绳绳,绵延至今。中国文字除一般文字通有的音、义以外,还有其特殊的形体,这种特殊形体的文字,超越了时间上的变化和空间上的限制,团结了中华民族,更造成了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文化整体。在古代世界曾经通行的各种古文字,都已先后天亡,独中国文字仍为一通行的活文字,广泛的在继续使用。三千年前所使用的一种书写符号,虽然数量已经增加,形体也有变化,但其构造的原则如旧,今天仍然继续使用,作为大众传播和文化交通的媒介。

中国文字的悠久历史,不仅保存了中国人的理想与抱负,记录了历史上的盛衰与兴亡,更使得这代代相传的文化传统,能得长存于天壤之间。因此,现代生活及社会上的许多现象,从口头上的成语,到一般礼俗习惯,以至政教制度,常可追根溯源,有迹可寻。譬如中国文字的直行书写,甚至目前用现代技术印刷的书籍,仍有采用狭直的行格,或在行格之间加用黑线。有人以为这是增加美观,而不知这种形式乃是根源于古代简牍的形制而来。这个悠长的中国文化传统之形成,主要是因为自古以来,继续不断地采用古代的经典作为基本教材的结果。因此,千百年来,人们只有钻研古圣先贤的著述,才能平步青云,在社会上飞黄腾达。

中国文字不仅中国人在使用,也是东亚许多其他民族的共同文字。他们虽各有自己的语言,但也采用中国文字作为他们文字的一部分。当他们与中国文化接触之初,用中国文字写作的书籍

便流传至其国内,如越南、朝鲜、日本及琉球,中国文字的应用于书写和书籍,都有一段很长的历史。直到如今,中国的方块字,仍被一些国家采用作为他们文字的一部分,而无法割离。

中国古代的著述,无论质和量,都有很辉煌的成就,已为许多国际学者所公认。中国古典文学很多是世界上第一流的作品。中国历史文献的丰富和详细,也没有其他民族的记载可比。自公元前 722 年起,直到今日,几乎没有一年缺少编年的记录。以数量来说,中国《十三经》白文的字数要比同性质和同时代(约公元前 10 世纪至 3 世纪)产生的《旧约圣经》多达几倍。至于中国书籍的产量,直至 15 世纪末年,比世界上各国书籍的总数还要多。^④ 而中国丛书、类书卷帙之繁,亦少有其他文字的著作可以比拟。

在公元前 1 世纪左右,因书籍种类增加,而产生了一种详细的分类制度,将各种性质的书籍,归纳为七大类和若干细目。公元 3 世纪所制定的一种四部分类法,在 5 世纪定型为经、史、子、集四大类,为中国目录学家沿用了 1500 余年,至今仍为编制古典目录者所遵循。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561 年——1626 年)将人类知识归纳为历史、诗歌和哲理三分法,是现在西方各种分类法的基石;除了经部以外,其他和中国的类目性质完全相同。培根又在哲理之下,再分为神道、自然和人文三项,这和中国将知识分为天、地、人的思想极为相似。这些观点虽然可能是偶合,但由于培根对于中国文化的景仰,他可能受到中国分类思想或方法的影响。^⑤

中国古代的典籍在质和量方面的发展,显示出古代中国在文字传播和学术研究上的成就,这乃是中国文化的基石。因此要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便得从这些古代文字记录的遗产中去探索。换言之,要了解中国古代典籍的制作、保存、传播和散佚,更需要从当时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背景中去研讨。